

绿意之下的代价与偿还

《森中有林》

杨奇清

落在不该落的人身上。

廉加海被吕新用弹弓误伤致盲，他选择不追究，此后余生孤独。这份宽恕与隐忍，仿佛是在为女儿的幸福默默抵偿。八年后旧爱王秀义再度出现，两人旧情复燃，命运的重击却猝然而至：王秀义的儿子为保护母亲杀死施暴者，廉加海的女儿廉婕在送证途中车祸身亡。影片最锐利之处在于揭示了命运运转的残酷逻辑：欠债的人未必是还债的人。吕新开伤害廉加海，代价却由廉婕来偿；王秀义的儿子杀了人，血债却落在廉加海头上。这笔债在代际间转移，如雪球般越滚越大，最终碾过了最无辜的人。

作为处女作，影片在视听语言上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廉婕被设定为视力不佳的按摩师，片中却出现了清晰的主观视点镜头。这种处理，或许意在让观众代入角色内心而非模拟其生理视觉，但在悬疑基调下，也可能分散焦点、引发不必要的猜测，是留待观众评判的开放题。

用表演偿还：成色与未尽之路

如果说郑执的导演首作在视听语法上尚有一些生涩，那么影片真正令人信服的力量，则来自演员们扎实而精彩的表演。

于和伟凭借廉加海一角荣获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用沉稳内敛的表演，撑起了角色跨越数十年的命运重量。高圆圆饰演的王秀义集柔情与母性于一身，游离在亲昵与无法逾越的隔阂之间，与过往的清新浪漫判若两人。韩庚饰演的吕新开得知妻子去世后跪倒号啕大哭，把悲剧感浓缩进表演瞬间。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乔杉和宋小宝的“反套路”选角。乔杉凭借卫峰一角拿下最佳男配角，被称作“换脸式演技”；宋小宝饰演的郝顺利，眼神中既有刀锋般的狠劲，又有看到弟弟尸骨时涌出泪花的柔软。

群像表演构成影片最坚实的情感地基，当影像语言偶有失语，是演员用身体和面孔替电影说出了未竟之言。对郑执而言，这是一部真诚且勇敢的首作，其继承了东北文学浓烈生猛的情感基因，也在影像化的路上留下了清晰的成长空间。那些视觉母题的未尽之处、作家美学向电影语法转译时的摩擦痕迹，都是创作者踏上新路时留下的真实脚印。它们标注了来路，也预示着前方更广阔的生长可能。



东北是什么颜色？中国银幕上的答案似乎早已定型——《钢的琴》的铁灰、《白日焰火》的雪白、《漫长的季节》中化不开的暮色。而沈阳作家郑执首次自编自导的《森中有林》，偏偏选择了绿色，用三个春天贯穿两组家庭、三代人近四十年的纠葛，以盎然生机包裹人性深渊，在绿意中书写宿命账本，最终，这笔沉重债务的清偿，在演员们的精彩表演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

绿意表象：东北叙事的另类颜色

影片的绿，是导演自觉的美学选择。郑执摒弃大雪纷飞、灰蒙蒙的东北意象，把镜头对准春天。工业废墟与自然生命力形成独特的对照——沈阳亚明市场、万顺啤酒屋被翻新三次对应不同年代，下岗潮的市井烟火气，一同融入了万物生长的节奏之中。

这一绿色策略，与近年东北叙事依赖冬季视觉包裹的影视化浪潮形成分野。“绿色”是一次冒险。当廉加海与王秀义在春天重逢，吕新开与廉婕在春天相识，春天便不再是诗意的点缀，而成为驱动命运的齿轮。也正因为万物生长，那些骤然而至的凋零才格外触目惊心。

绿意也是郑执“写我熟悉”原则的延伸。他从小在菜市场边的小饭店长大，“只有把故事放在最熟悉的环境里写，才觉得它最可信”。这种在地经验，使他摒弃东北叙事已成经典的视觉范式，试图用另一种颜色重写同一片土地。

宿命账本：代价书写与影像裂隙

绿色帷幕拉开后，《森中有林》真正讲述的，是一笔跨越四十年的宿命之债。叙事驱动力来自一个冷峻的结构：每个人在获得时，都必须付出代价，而代价往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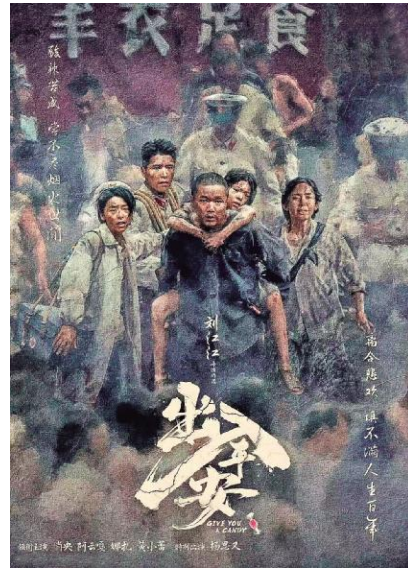
《出平安》：瓦砾之上的人性闪光

邻建业 王天昱

《人生大事》导演刘江江携《出入平安》回归。他没有刻意渲染悲情，而是把镜头对准死刑犯与狱警这对组合，在断壁残垣中串联起身份的转变、宿命的隐喻和温情的瞬间，使“出入平安”这一日常祝福语，被赋予了跨越生死、承载救赎的厚重意蕴。该片打破传统灾难片的框架，将平凡人在绝境中的坚守与善意，淬炼成废墟上最耀眼的人性光芒。

警囚羁绊：从针锋相对到生死相依

影片最动人的内核，在于死刑犯郑立棍与狱警尉迟晓从对立走向信任的情感羁绊。故事从一场未完成的行刑开始，郑立棍在押赴刑场途中遭遇地震，侥幸逃生。此时的他手铐加身，桀骜绝望，唯一的执念是找到待产的妻子。天灾成了废墟，法律所赋予的身份标签被撕毁，警囚对立悄然消失。郑立棍本可趁乱逃走，却因牵挂妻子折返险境。当尉迟晓看到这个“罪人”身上闪现的善良与担当时，内心的偏见开始消融。他不再将自己视为刻板的执法符号，而是选择与郑立棍并肩作战，两人的关系从互相提防变为生死相依的同伴。郑立棍在救人中摆脱了内心的束缚，找到了人性的本真；尉迟晓在坚守职责的同时学会了共情与包容，读懂了人性的复杂与柔软。从针锋相对的“猫鼠”到生死与共的伙伴，这场绝境中的相遇，已不仅是两个人关系的转变，而且是最纯粹的信任与善意的彰显。



西游隐喻：宿命之下的自我救赎

影片的精妙之处在于把西游元素融入叙事，给人物的救赎之路增添宿命感和文化厚度。郑立棍的人物设定处处与孙悟空相呼应，囚服编号342对应孙悟空在生死簿上的年龄，暗合打破宿命的特质。手铐就是他的紧箍咒，既象征着法律的制裁，也锁着他内心沉重的负罪感。他最后身着齐天大圣戏服徒手救人的画面，正如挣脱紧箍、一心向善的孙行者，在绝境里完成自我救赎。狱警尉迟晓对应二郎神，是规则的守护者。他眉眼间的玻璃划痕如同二郎神的“天眼”，让他得以穿透表象，超越非黑即白的简单化认知，懂得了悲悯与共情。郑

立棍在救人时放下罪孽、挣脱枷锁；尉迟晓则在坚守职责的同时冲破了刻板成规的束缚。这场现代的“取经之路”没有神通法术，却有朴素的善良与坚守，把西游隐喻和人性表达融合在一起，使救赎主题更具感染力。

温情瞬间：婚礼与情书里的善意与坚守

废墟之上的婚礼与情书彩蛋是影片最动人的部分。尉迟晓与濒死的爱人举行了一场简陋却极具力量的婚礼。断壁残垣间，幸存的囚犯与警察们用断裂的钢筋搭建起简易的喜堂，没有宾客的举杯祝福，却时刻要警惕余震的侵袭，但这份绝境中的坚守，比世间任何盛大的仪式都更叩击人心。情书彩蛋是整部影片的点睛之笔。救援小队的成员代替震中逝去的人们，写下了一条条未能说出口的牵挂，都是没能写完、没能寄出的遗憾告白。其中，他们替一位罹难者写给他的爱人银白雪的那封情书，没有华丽辞藻，字里行间满是朴素的牵挂和真挚的期许。这些代笔的书信，褪去了他们身上“罪人”的粗粝，展现出内心最柔软的角落，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

从《人生大事》到《出入平安》，导演刘江江始终关注平凡人在命运关口的抉择。影片以唐山大地震为背景，用朴素的故事告诉我们：瓦砾终会被清理，伤痕终会被抚平，但灾难中迸发出的朴素的善意与坚守，却有着历久弥新的力量。能在苦难中坚守善良、守护所爱，这本身就是人性最动人的光亮。

《消失的人》：社会现实的极端镜像

郭燕 李丹宁

电影《消失的人》是台湾导演程伟豪根据作家贝客邦的网络悬疑小说《海葵》改编的悬疑新作。影片以一栋居民楼内男孩的突然消失为叙事主线，深度融合悬疑与恐怖元素。通过套层叙事与富有隐喻性的空间，构建起一幅交织着家庭伦理、个体挣扎与时代困境的社会现实图谱。片中相互嵌套的故事，既是悬疑解谜的线索，也如同一面面镜子，映照出当下诸多真实社会问题的极端形态。

空间叙事：立体迷宫与封闭环境的视听隐喻

影片拍摄于重庆，这座中国西南城市自带某种魔幻质感。影片开场，导演用大量的俯拍加空镜将山城重庆的城市空间转化为悬疑电影中常见的视觉奇观。从居民楼穿插而过的轻轨，在半空中纵横叠加的高架，高楼在画面中彼此挤压，空间的交错暗喻着都市人错综复杂的命运轨迹，以及真相总是被层层掩盖的电影主题。

随着镜头的移动，画面从全景式的城市俯拍骤然切入老旧居民楼，空间从“开放”的“混乱”转变为相对“逼仄”的“封闭”。昏暗的楼道、斑驳的墙皮、狭窄的走廊，共同烘托出一种充斥着冷漠与困顿的市井人生况味。导演敏锐地捕捉到这种封闭空间的压迫感，将角色的焦虑、恐惧与绝望渲染得淋漓尽致。通过空间转换完成了悬疑氛围的视觉营造，也由此描绘了都市人渺小而孤立的生存实景。

现实映照：社会镜像下的多轨生存互文

导演将家庭教育、女性生存与失业焦虑三大社会热点交织并置，共同构成

了这幅矛盾共生的社会镜像。

核心叙事：失踪谜案与家庭教育困境。“寻找失踪孩子”是影片的核心主线，导演以典型侦探电影中的解谜式手法开场——绑架？凶杀？孩子哪去了？动机是什么？而离奇失踪本身，就是一道天然的谜题，这一巨大悬念从一开始便牢牢抓住了观众。但随着调查的深入，这场“解谜之旅”所带来的惊悚与恐怖，早已超越了“真相”本身。失踪的孩子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诸多家庭内部的问题：为生计而终日忙碌的父亲、不愿承认孩子有问题而情绪化的母亲、缺少陪伴的孩子。影片所刻画的家庭困境并非个案，而是无数家庭真实境况的缩影。

支线映照：独居女性的警醒与自救。主线故事推进的过程中，第二条叙事线索随之展开，隐藏在同一栋居民楼内的独居女性林雨彤的秘密被缓缓揭开。林雨彤这一角色，是当代城市中庞大独居女性群体的缩影，而她的“秘密”，则是影片对独居女性生活问题的现实观照。林雨彤的遭遇，交织着窥视、侵犯、沉默的恐慌，以及职场与社会偏见下的隐忍与不堪。导演在此并未将女性塑造为只能被动等待救援的弱者，而是通过林雨彤的内心挣扎与反击，展现了女性独特的心理防御与自救本能，让影片的社会批判性从单一的女性问题延伸到了都市个体的安全困境。

时代侧影：失业焦虑与精神幻梦。随着故事的发展，影片关于失业焦虑的第三条线索也引申出来。在经济结构转型与人工智能高速迭代的背景下，失业不仅是失去经济来源，还是对社会身份与价值认同的沉重打击。影片极其写实



地刻画了严午失业后的无力感，并通过幻觉与梦境，将其内心的焦灼外化为恐怖意象，“肢解尸体”“鱼缸异动”这些画面，是角色内心深处极端焦虑、无助的视觉具象。这个普通人在极度焦虑中一步步滑向赌徒的边缘，甚至卷入“弑父”的共谋，其命运轨迹最终与核心悬疑案产生了宿命般的交集。

三线并行的叙事结构与穿插于其中的幻梦，共同构成这部悬疑电影的骨架。三个故事并非虚构，恰是家庭教育困境、独居女性安全隐患、失业危机等真实社会现状的极端镜像。对于悬疑类电影而言，缜密的逻辑是赢得观众信服的基石。在多线叙事的高难度挑战下，影片部分情节的衔接与细节的铺陈，相较于原著及同题材改编作品略显疏漏，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故事的完整性与说服力。